

● 中国历史

论孔子的德治思想

徐 柏 青

(湖北师范学院 学报, 湖北 黄石 435002)

[作者简介] 徐柏青(1955-),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文学研究。

[摘 要] 孔子的德治思想既是指与“为国以礼”相辅相成的治国方针,又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孔子的所谓“德”实际上就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所倡导的“仁”。孔子认为,实行以德治国的方针,就是要遵循仁德的原则,贯彻爱人的思想,采取德政措施,做好富民、教民、取信于民以及执政以德的工作。孔子的这些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孔子;德治思想;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559-05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德治”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孔子“德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的“德治”思想既是指与“为国以礼”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即治理国家不仅要有完备的礼法制度,同时也要“道之以德”,以德治国;又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即执政者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执政时其行为要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

治理国家是以道德为主还是以政法为主,是凭借礼法的力量,还是凭借刑罚的威势,这个问题可以说在孔子的时代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政》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的“道”是治理的意思^[1](第12页);“政”即政法;“刑”即刑罚;“德”即道德;“礼”即礼法制度。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并辅之“以刑”,一是“以德”并辅之“以礼”,如果把二者加以比较,那么后者优于前者。因为用政法治国,用刑罚加以约束,人民虽可以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治国,用礼法加以约束,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孔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治国的方针中应以何为主的问题。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但并不排斥法,主张治国以德为主而以礼法为辅。

我们知道,孔子的“德”实际上就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所倡导的“仁”,后人称之为“仁德”。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和标准,是道德规范的概括与结晶,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则是爱人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人们是否做到了“仁”的标准。孔子认为,实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就是要遵循仁德的原则,贯彻爱人的思想,采取德政措施,做好以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作。

首先是富民,即要让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子路》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是孔子的主张,并使他的学生冉有深受影响。《先进》记载:孔子与他的几个学生“各言其志”,冉有说他的志向就是“足民”。所谓“足民”,就是使老百姓人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冉有的这

一志向正是受到他的老师影响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民富足呢?《学而》记载: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就如何富民的角度看,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节用”;二是“使民以时”。所谓“节用”,就是要求政府要大力节省财政开支^[1](第4页)。“节用”的实质就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因为政府的一切费用都是取之于民,如果政府财政开支过大,甚至铺张浪费,势必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所以“节用”也就是“富民”之举。所谓“使民以时”,意为政府抽调民力应当在农闲的时间里^[1](第4页)。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农业生产并获得好的收成是使人民富裕的重要基础。发展农业生产要靠农民,要获得好的收成就要抢抓季节,“不违农时”。如何处理政府抽调民力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呢?孔子提出了“使民以时”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害,这同样是富民之举。

从《论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孔子在主张“节用”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的主张,即政府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坚决反对统治者剥削人民。《颜渊》记载: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

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是孔子的学生;“彻”是周代的租赋制度,即十分抽一的税率^[1](第127页)。有若认为,国家为了维持正常的开支需要向人民征税,但征税必须适度,不能过多地增加人民的负担,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人民富起来。因为百姓富足了国家也就富足了;如果百姓不富足,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富足。有若的这一主张正是对其老师思想的发挥。孔子虽然主张国家适度征税,但坚决反对统治者个人聚敛财富。《先进》记载: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之所以对冉求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这是因为“季氏富于周公”,可是冉求却又替他搜括,增加更多的财富。在孔子看来,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手里,势必造成广大人民的贫穷而影响到国家的富强和安定。因此,他主张“均贫富”。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当作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当作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第173页)(《季氏》)在这里,孔子所说的虽然是关于财富分配的原则问题,但也可以说是关于如何富民和强国的问題,因为要使广大人民都富裕起来就必须限制少数人的贪欲,只要广大人民都富裕起来了,国家也就会安定团结,欣欣向荣。

其次是教民,即要加强国民教育。我们知道,孔子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普及,力主“有教无类”,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在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完全可以说是他的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不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而且也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并把这看成是德政之举,前述所引孔子与冉求的对话就是明证。在国民教育的问题上,孔子主张“先富后教”,也就是说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以后就应当使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所主张的国民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包括对人民实施礼义教育和对人民加强军事训练两个方面,而对人民实施礼义教育则是主要的方面。例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曾表达他的理想说:“千乘之国”,如果让他去治理,待到三年,可使国人“有勇,且知方也”(《先进》)。“方”,即道义。孔子的另一学生冉求则认为,治理国家既要使人民富足,又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但他表示自己的能力“可使足民”,至于对国人的礼乐教化则“以俟君子”。由此可见,无论是子路的理想还是冉求的志向,他们都十分重视对人民的礼义教育。对人民实施礼义教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人民懂得礼义,遵守礼法,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孔子极力主张用道德去感化人民而反对杀戮。《颜渊》记载: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国家治理的好坏,犯罪率的高低,不取决于杀人而取决于执政者是否真正想用善道去教育引导人民。因为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执政者如果真正地用善道去教育引导人民,广大人民也就会像风吹草低一样被感化而自觉地走上善道。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对“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句话大为赞赏,认为“诚哉是言也!”(《子路》)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主张“善人为邦”,更重要的是因为通过善人治理国政

就可以克服残暴的政治,免除对人民的虐杀。

孔子认为,实行以德治国的方针,不仅要对人民实施礼义教育,而且还要对人民加强军事技能的训练。当然,孔子的这一主张是具有针对性的。众所周知,孔子所处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因而军事问题就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军事进攻或军事防御也就成为当时各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加强军事进攻或军事防御,国家都得大量征兵,这样广大人民就得承受巨大的生命牺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提醒执政者必须加强对人民的军事训练,不要草菅人命。他尖锐地指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并主张:“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也就是说因战争的需要而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训练,不仅要有好的老师,而且还要保证充足的训练时间。这样在刀光剑影的战争中,人民或许能较少地付出生命牺牲。总之,在孔子看来,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尽可能地减少人民在战争中的生命牺牲不仅是德政之举,而且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第三是取信于民,即政府要获得人民的信任。《颜渊》记载: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事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粮食储备要充足,军事力量要强大,政府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应该说这三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德政的基本内容。但如果对这三者的轻重作区别,孔子则明确地表示,首先应当“去兵”,其次是“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政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而政府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对人民讲诚信。孔子曾深刻地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𡗗,小车无𡗗,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作为一个人对别人应当讲诚信,政府也是一样,必须对人民讲诚信。在孔子看来,政府取信于民不仅是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而且也是政府获得民心,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所以,孔子特别重视“信”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宁可“去兵”、“去食”,也不能不要“信”。

那么,如何才能取信于民呢?《为政》记载: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意为如何才能使人民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并相互劝勉地为国家效劳^[1](第20页)。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如何才能获得民心的问题。对此,孔子提出了以下三个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所谓“临之以庄”,是指政府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人民的事情;所谓“孝慈”,是指执政者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五上》),把自己对待父母和子女的爱心推及到广大的人民;所谓“举善而教不能”,是指选拔贤才,并扶持弱势之人。孔子认为,政府如果能遵循这三条基本原则,那么人民就一定会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并相互劝勉地为国家效劳,民心所向,国家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条作为政府取信于民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闪光的思想。第一条实际上是指政府的工作作风;第二条是指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第三条是对政府工作的具体要求。在孔子看来,政府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在具体工作中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做好:一是“举善”,二是“教不能”。“举善”,即选拔贤才,贤才的标准是“直”。《为政》记载: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告诉他:“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正直者待人诚恳,没有那么多的坏心眼,所以孔子把“直”看做是“仁”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政府要获得民心就要把那些仁德之人、正直之士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让他们来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假如那些虚伪之人、奸诈之徒把持了国家的政权,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民心。因而在孔子看来,选拔贤才特别是选拔正直之士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工作。孔子认为,在“举善”的同时还要“教不能”。所谓“教不能”实际上是指扶持弱势之人。对此,孟子曾作过这样的发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梁惠王下》)可见,“教不能”即关心和扶助弱势之人是德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

第四是执政以德,即执政者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按照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执政。如前所述,孔子十分重视“举贤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政治,说到底还是人的活

动,因而执政者的道德素质如何不仅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孔子十分注重执政者的道德情操和在执政中的道德行为,并把这看成是“德治”的重要方面。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共”,即环绕^[1](第11页),如果执政者按道德规范执政,那么人民就会像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地环绕着他。因而,他要求执政者一定要按照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执政,做到一身正气。《颜渊》记载: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题,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的意思就是端正,这虽然是就字面的意思加以引申发挥的,却揭示出深刻的道理。正如孔子自己所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如果执政者在执政活动中自己的思想行为端正了,那么即使不发布政令,事情也行得通。可见,孔子对于执政者的道德素质是何等的重视。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孔子要求执政者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努力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应当努力地端正自身的思想行为,做群众的榜样。孔子对执政者的榜样作用十分重视,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季康子患盗,向孔子请教办法,孔子尖锐地指出:“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这充分说明执政者如果道德情操高尚,思想行为端正,成为群众的榜样,那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从政以后要做到“先之劳之”(《子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严格要求自己,做群众的表率,关心群众的生活,孜孜不倦地尽职尽责地工作,永远不懈怠;要“无伐善,无施劳”(《公冶长》),永远保持谦虚逊让的作风;要“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担负起役使人民的工作,时时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得到利益,怎样才能使人民“劳而无怨”(《尧曰》),愉快地劳作和生活。可见,孔子对执政者“为政以德”从而实现真正的德治寄予了多么殷切的希望!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丰富的,也是深刻的,它不仅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从当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国必先富民,在富民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明确告诉我们:治理国家,不仅要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也要积极满足人民的文化教育的需求;不仅要努力地使全体人民致富,而且也要努力地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素质。虽然我国人民的生活目前已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仍然还有许多人的生活不够富裕,甚至处在贫困之中。要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政府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力发展经济,规范分配秩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深刻论述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努力做到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党和政府就应当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就应当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人民的要求,办好人民的事情,积极履行政府的职能,用爱心执政,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应当选拔贤才,让贤德之人、正直之士担任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

在当代社会,我们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以及执政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应当时时牢记自己是受人民的委托执政的,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做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执政为民,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到思想行为端正，不搞特殊化，更不能搞腐败；努力加强自我修养，真正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02-11-18.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On Confucius' Ideology of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XU Bai-qing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Huangshi 43500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 Bai-qing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Vice Chief editor,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of Qin-Han Dynasty.

Abstract: Confucius' ideology of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is not only a country administration orientation which complemented by *govern the country with courtesy*, but also a requirement to the government. Confucius' so called *morality* is actually *benevolence* whi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advocate. As he thought, to carry out the guidelin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courtesy is to abide by the benevolence principle, to follow the humanity ideology, to take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to enrich the people, teach the people, establish credibility among the people and to administer the country with courtesy. Confucius' such ideas could still serve as a model from which we can benefit greatly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Confucius;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significance as a model